

# 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

——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

刘中民

---

[内容提要]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巴林教派矛盾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其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派矛盾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其次,教派矛盾成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最后,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因此,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在中国,学界要做到历史、客观地研究,在舆论界宣传层面要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关键词] 中东变局 巴林 教派矛盾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6)02-0139-09

---

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不仅影响着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还影响着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对阿拉伯国家转型有重要作用(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阿拉伯起义的浪潮加深了近年来一直存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族群和宗教关系的紧

张,使其再度走上中东政治的前台”<sup>①</sup>。

近几年来,教派因素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反映到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便形成了一种言必称教派矛盾的倾向,这种有着深刻政治意蕴的舆论倾向在中东和西方媒体中最为明显。当前,舆论界对教派矛盾的认识多存在简单化之嫌,似乎中东国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教派矛盾和冲突就必然存在。但是,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在长期的历史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和谐共

---

\* 本文系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项目编号:08JJDGJW25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建设项目、上海市高校智库建设项目的资助。

处,当前凸显的教派矛盾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因此,客观评估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准确认识教派矛盾的实质,无疑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分析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以巴林的教派问题为案例,分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及其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以此透视中东教派矛盾的实质。

### 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矛盾的历史演进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有着悠久的历史,自1400多年前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围绕如何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产生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长期对立的教派,前者主张从最接近穆罕默德的志同道合者中产生,后者主张只能从穆罕默德的直系亲属中产生。<sup>②</sup>随着时间的推移,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什叶派又分化成不同的支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伊斯马仪派、宰德派、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等,其中十二伊玛目派是主流派。当前,什叶派约占全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的10%—20%。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阿塞拜疆,在黎巴嫩、土耳其、科威特、沙特等国也有规模较大的什叶派群体。此外,宰德派主要分布在也门,德鲁兹派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阿拉维派主要在叙利亚。<sup>③</sup>

在历史上,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物和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世俗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取得主导地位,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趋势。<sup>④</sup>但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矛盾的激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出于增强伊朗革命的合法性以及“输出革命”等方面的需要,伊

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淡化自身的什叶派色彩。例如,在革命后不久,时任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部长的穆罕默德·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就宣布禁止在讲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此后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要求他们和逊尼派一起,进行公开的集体礼拜。<sup>⑤</sup>但是,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强烈冲击了原有的地区格局,尤其是伊朗“输出革命”战略对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沙特、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伊拉克等地区强国产生强烈冲击,教派矛盾对伊朗与沙特、伊拉克等国家关系的影响呈明显上升的态势。

首先,沙特与伊朗关系中的教派矛盾日益凸显。

伊斯兰教在沙特主要表现为瓦哈比派,并对什叶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sup>⑥</sup>“根据瓦哈比的传统,什叶派教徒被视为象征着邪恶的毒蛇。任何地方的什叶派都是瓦哈比派和沙特人的敌人。”<sup>⑦</sup>尽管沙特与伊朗之间存在教派矛盾,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沙特与伊朗的矛盾并不突出,并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盟友。而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强烈谴责沙特的世袭君主制、攻击沙特为美国走狗、向海湾君主制国家输出革命的做法,都导致伊朗与沙特的关系急剧恶化。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全力支持伊拉克;1987年,伊朗朝觐者在麦加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伊朗人死伤;1988年,沙特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什叶派国家与逊尼派国家的矛盾”<sup>⑧</sup>。

从本质上来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并非简单的教派矛盾,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输出革命”的激进外交对沙特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和国家安全均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使双方的教派矛盾成为权力斗争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在此背景下,“代表逊尼派的沙特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当中展开了以宗教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并将其与自身争取地区霸权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差异和冲突被放置在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扩展自己地区影响、谋求各自政治目标的斗争的大背景

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sup>⑨</sup>。

其次,伊朗与伊拉克教派矛盾的激化与两伊战争。

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在本质上并非纯粹的宗教战争,因为双方的民族矛盾、边界争端以及对海湾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都是战争的重要原因。但双方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了诱发和影响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朗穆斯林中有96%属于什叶派,逊尼派仅占4%。在伊拉克,穆斯林的60%为什叶派,40%为逊尼派。历史上由于人数众多的什叶派社团的存在,两国的宗教界之间一直有密切的交往。长期以来,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一直对伊拉克境内的三大宗教圣地充满敬仰,而伊拉克的什叶派社团则经常寻求伊朗什叶派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带有政治倾向的什叶派组织,如伊斯兰宣教党、法蒂玛党、伊斯兰革命党、圣战者组织大都有伊朗的背景。<sup>⑩</sup>

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前的伊拉克,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长期执政,并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什叶派对逊尼派复兴党政权十分不满,什叶派骚乱也时有发生,但均遭到了复兴党政权的残酷镇压,并引起了伊朗霍梅尼政权的强烈不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伊拉克被伊朗视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前沿阵地。霍梅尼认为,只有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伊朗式的什叶派政权,才能继续向海湾西部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

由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吸引和伊朗的宣传鼓动,曾经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期间与其交往甚密、有“伊拉克的霍梅尼”之称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不断煽动什叶派推翻政府,要求伊拉克变成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此后,在伊朗的影响和策动下,什叶派教徒不断揭竿而起,起义连续不断。面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伊拉克宣布宣教党为伊朗的“第五纵队”,同时逮捕了什叶派精神领袖萨德尔,并于1980年以“叛国罪”将之处以死刑。此后,双方的攻击和谴责不断升级,双边关系急剧恶化。1980年9月22日,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全面爆发,教派矛盾构成了两伊战争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并非两伊战争的根本原因。

(二)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教派矛盾的新变化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的瓦解为长期以来饱受打压的什叶派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进而使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国际关系中的教派因素日益凸显。伴随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民主进程”的启动,什叶派逐渐确立了在伊拉克政治中的主导地位。2005年12月伊拉克全国议会选举之后,什叶派基本确定了其在新政府和议会中的绝对优势。<sup>⑪</sup>

在“民主改造”伊拉克的过程中,美国完全排斥前萨达姆政权势力参与伊拉克重建,导致在政治重建中必须倚重什叶派势力,客观上形成了按照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教派和族群结构进行分权的政治格局,促成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的崛起。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态,也在海湾周边国家的什叶派中间产生了外溢效应,而这种外溢效应又被沙特、约旦等海湾国家进一步夸大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崛起。

首先,从客观方面说,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对海湾周边国家长期遭受逊尼派打压的什叶派产生了示范效应,什叶派要求扩大政治权利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政治抗议运动。在约旦,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取得主导政治权力,主要由伊拉克难民群体构成的什叶派政治团体也开始向政府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在伊拉克什叶派胜利的影响下,巴林的什叶派开始争取政治权利,谋求通过政治抗议和民主变革挑战逊尼派王室政权。在海湾地区大国沙特,能源富集的东部地区的什叶派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也不断上升,并表现出一定的分离主义倾向。<sup>⑫</sup>

其次,从主观因素看,美国和沙特、约旦等海湾国家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以及什叶派联合的担心,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来概括所谓的反逊尼派和反美力量。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什叶派新月”的说法,认为从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个“什叶派新月”,与之相对应,埃及、沙特和约旦则构成“逊尼派三角”,“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三角”之间是对立的关系。<sup>⑬</sup>事实上,早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沙特就对什叶派力量的上升充满了忧

虑。当时,沙特的瓦哈比派学者认为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中东新秩序正在出现。例如,沙特著名宗教学者萨法尔·哈瓦里(Safar Al-Hawali)等人警告说,一个由伊朗、(阿拉维派领导的)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湾其他君主国的什叶派组成的什叶派阵营将要形成。沙特还在2006年开展了一项国家安全评估项目——《什叶派新月地带与什叶派复兴:神话和现实》,专门对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力量进行评估。<sup>⑪</sup>

美国也倾向于从战略高度看待什叶派的影响。中国学者吴冰冰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美国已经把伊朗视为在中东的头号敌人,突出教派矛盾有利于孤立伊朗。其二,以突出教派矛盾来掩盖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实质。中东地区两个阵营对立的实质是亲美和反美的矛盾对立,把这一矛盾更多地包装成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可以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从而把亲美与反美阵营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固有教派矛盾。其三,以教派矛盾为借口来掩盖沙特等亲美政权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以此来帮助其巩固自身的统治。沙特、巴林等国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其中很多是源于其自身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在突出教派矛盾的背景下,这些不稳定因素常常被归于伊朗的密谋和干涉。<sup>⑫</sup>上述分析无疑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美国利用和夸大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实质。

### (三)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

在中东变局中,教派矛盾突出表现为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教派矛盾及其外溢导致的地区范围内的教派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通过外溢形成以教派为标识的阵营分化,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的教派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演变为代理人之争,导致这些问题更趋复杂,政治和解更加困难,同时也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方舆论看来,伴随教派因素在中东变局中作用的上升,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开始从教派利益的角度观察“阿拉伯之春”对于自身的机遇和挑战。“在许多逊尼派看来,阿拉伯起义为削弱伊朗—真主党—叙利亚的什叶派轴心提供了机会。因为对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所有的什叶派都是忠诚于伊朗的

“铁杆分子”(iron-clad Iranian loyalists),而伊朗则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并坚信伊朗对叙利亚事务进行了深度干预。”<sup>⑬</sup>什叶派则认为,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力量在转型阿拉伯国家取得执政地位、逊尼派反对派对叙利亚阿萨德什叶派政权的严峻挑战、巴林逊尼派政府对什叶派抗议的镇压、伊拉克逊尼派反对派挑战什叶派马利基政府、沙特等国家大力支持巴林逊尼派政府和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都使什叶派认为逊尼派的威胁在不断扩大”,并积极利用“阿拉伯之春”所提供的机遇挑战逊尼派主导的政府。因此,“过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什叶派,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家积极地争取其权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sup>⑭</sup>

在此背景下,长期存在的教派分歧在逊尼派和什叶派普通民众之间也进一步凸显。2012年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那些什叶派占少数的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穆斯林多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至少有40%的人不接受什叶派为穆斯林,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什叶派的宗教活动诸如参拜圣陵、为逝去的宗教人物祈祷等为非法行为。<sup>⑮</sup>

总之,自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和叙利亚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层面,复杂的教派矛盾不仅突出表现为沙特和伊朗围绕巴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的矛盾,还表现为逊尼派内部的复杂矛盾(如沙特与土耳其围绕逊尼派领导权的矛盾)。对此,有学者评价指出“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什叶派势力伊朗、逊尼派激进势力沙特阿拉伯和逊尼派温和势力土耳其三大力量之间展开。”<sup>⑯</sup>下文主要以巴林问题中的教派矛盾为主要案例,分析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影响及其实质。

### 中东变局之前巴林教派矛盾的历史演进

巴林是海湾地区的小国,西邻沙特,东临波斯湾,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之一。巴林

人口约 120 万,其中本国公民占 46%,约 55 万人。在本国公民中,什叶派约占 70%,逊尼派约占 30%,掌权的哈利法家族属于逊尼派。<sup>②</sup>但在中世纪巴林的历史上,什叶派曾经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什叶派人口至今依然占巴林人口多数的原因。

伴随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于七世纪传入巴林,巴林由此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逊尼派为伊斯兰教的主流教派,但巴林人在教派归属上却选择了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卡尔马特派。由于长期不满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巴林于 894 年发动起义,宣布脱离阿拉伯帝国,甚至在 929 年攻进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11 世纪中期,巴林在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打击下走向灭亡。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巴林沦为葡萄牙的殖民据点。1602 年,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王朝赶走巴林的葡萄牙殖民者,巴林一度成为伊朗的一部分,并使什叶派得以不断壮大,这也是巴林与伊朗什叶派关系密切的重要原因。当时,巴林与黎巴嫩的贾巴尔·阿米尔(Jabal Amil)和伊拉克的库法(Kufa)、纳杰夫(Najaf)一起成为什叶派的重要中心,他们共同成为伊朗萨法维王朝培训神职人员的中心,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sup>③</sup>也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缘故,当今的逊尼派政府及其支持者将什叶派反对派贴上了“伊朗萨法维王朝忠诚者”<sup>④</sup>的标签。

18 世纪末,什叶派在巴林的主导地位被逊尼派所取代。1782 年,来自卡塔尔东部的逊尼派哈利法部落(Al Khalifa Tribe)征服巴林,什叶派教徒或者被杀或者被驱逐,逊尼派哈利法家族对巴林的统治一直延续至今。<sup>⑤</sup>从 19 世纪初至 1970 年获得民族独立,巴林一直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在此期间,巴林王室就曾经有依靠沙特逊尼派势力镇压什叶派反抗的先例。19 世纪 20 年代,哈利法家族求助沙特的达瓦思尔部落(Dawasir Tribe)出兵巴林驱赶什叶派。<sup>⑥</sup>此后,沙特一直对巴林政治拥有重要影响,争夺对巴林的影响也因此成为沙特与伊朗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在巴林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左翼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宗教的作用并不显著。巴林于 1970 年获得独立后,占人口 70%的什叶派对逊尼派王室的歧视

性政策一直严重不满。但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巴林的反对派一直由世俗派所主导,其中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巴林和其他海湾国家的什叶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开始出现激进的什叶派组织。”在此背景下,伊朗的教士纷纷来到巴林布道,而巴林什叶派组织“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缩写为 IFLB)的成员也访问了伊朗。<sup>⑦</sup>此外,巴林什叶派反对派人士还前往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神学院学习;在星期五于清真寺举行的宗教活动中,什叶派开始讨论就业和社会公正等问题并表达其不满情绪。<sup>⑧</sup>1981 年,巴林政府宣布挫败了在“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领导下试图发动政变的一个组织,并宣称该组织在伊朗德黑兰接受培训,甚至因此怀疑一些温和的什叶派教徒也是伊朗的“第五纵队”。<sup>⑨</sup>总之,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因素在巴林内政及其与伊朗关系中的作用呈日益上升的态势。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的活动日趋活跃。在 1994—1998 年间,什叶派村庄发生了一系列街头抗议和冲突。根据“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研究报告,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威权体制、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停滞的经济以及广泛存在的针对什叶派的歧视。<sup>⑩</sup>在什叶派社团看来,巴林政府是一个代表逊尼派利益的腐败体制,对什叶派地区的贫困视而不见。<sup>⑪</sup>在 1994—1998 年的四年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街头冲突成为巴林社会的一种常态,也被称之为“1994—1998 年大起义”。逊尼派王室政府对街头抗议作出了强硬的反应,数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一部分反对派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sup>⑫</sup>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结果之一是“宗教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抗议运动的特征之一。<sup>⑬</sup>

2001 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力度推进海湾国家的民主变革。在此背景下,美国敦促巴林王室进行以取消歧视什叶派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但巴林王室允诺的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兑现,导致 2004 年至 2005 年巴林再度发生什叶派的反政府抗议和严重的教派冲突。在此背景下,什叶派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这些组

织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组织领导,既有温和的容纳各种什叶派人士的反对派组织,也有宗教色彩相对浓厚的反对派组织,其共同点在于要求逊尼派王室取消教派歧视政策,改善什叶派的社会经济状况。<sup>②</sup>由此可见,巴林王室与反对派矛盾的核心仍然是由治理不当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教派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的载体。此后,巴林什叶派的政治抗议一直持续不断,直至2011年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掀起的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浪潮。

### 中东变局以来巴林的教派矛盾及其实质

中东变局的发生构成了引发巴林动荡和教派矛盾激化的导火索。2011年2月14日,巴林爆发了以什叶派反对派为主体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占领了首都麦纳麦的珍珠广场。在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巴林逊尼派政权对游行示威进行了严厉镇压,但始终无法控制局面,大规模游行示威依然持续不断。2011年3月14日,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决定出兵巴林,1000名沙特军人和500名阿联酋警察越境进入巴林,帮助巴林政府镇压示威群众,<sup>③</sup>才使局面得到初步控制,但民众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在巴林动荡的过程中,教派矛盾的影响及其实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纷纷利用教派进行政治动员。巴林逊尼派政府、政治组织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政治合法性,而什叶派长期的边缘处境以及所遭受来自政府的严厉镇压,进一步强化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和教派认同,一切都强化了巴林冲突的教派色彩,加剧了教派对立和宗教情绪的极端化,并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

巴林陷入动荡后,逊尼派政权通过主导和控制舆论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叛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教派冲突话语的延续。巴林民众抗议浪潮爆发之初,参加者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这在当时抗议者高呼的“没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只有巴林人”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但反对派很

快就发生以教派为标志的阵营分化,这无疑为巴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政府声称暴动的根源在于教派冲突”,“是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暴动”<sup>④</sup>。在政府渲染教派冲突的同时,“民族联合阵线”(National Unity Gathering)和巴林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派(尊古派)等逊尼派政治组织也不断强调“现政府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神权政体”;官方控制的媒体也极力炒作教派矛盾,例如巴林《国家报》(*Al Watan*)、“巴林论坛”(Bahrain Forums)网站都不断熏染教派冲突以及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前者强调伊朗始终煽动巴林什叶派暴动,进而“入侵巴林”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后者则在2012年什叶派宗教节日阿舒拉节之际就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展开讨论,强调“逊尼派不相信什叶派是真正的穆斯林”。<sup>⑤</sup>

因此,逊尼派王室政府及其控制的媒体和政治组织都不断强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的教派冲突逻辑: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支持包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革命——镇压什叶派革命亦即反对伊朗的颠覆——教派冲突加剧。但是,“至今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伊朗直接支持了巴林的示威游行。巴林反对派强调民众的诉求是更合理的分配权力和利益,而非挑动教派矛盾”。<sup>⑥</sup>事实上,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民众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式神权的政治目标。2009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什叶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63%和25%,<sup>⑦</sup>反对者远胜于支持者。但政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者的清算,如取消参加抗议的什叶派学生的奖学金,搁置授予学位和就业歧视等措施,都“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sup>⑧</sup>。巴林政府的教派冲突和“伊朗阴谋论”的话语,无疑为沙特等外部势力以捍卫逊尼派整体利益为名介入巴林事务提供了依据,“逊尼派教士惊呼必须警惕中东的‘什叶派化’(Shiitization)”,而“巴林的什叶派也认为他们是在为地区内的整个什叶派,尤其是在为毗邻而居、长期遭到压制的沙特什叶派而战”。<sup>⑨</sup>在这种背景下,巴林内部的教派矛盾从国内矛盾演变为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矛盾,而教

派矛盾则成为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争夺的外在表现。

第二,沙特以教派矛盾为由介入巴林事务,教派矛盾沦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为防止巴林逊尼派政权倒台,避免巴林建立什叶派政权并倒向伊朗,同时避免什叶派抗议波及到海合会国家,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不断从伊朗威胁的角度强调巴林的教派冲突,并以海合会的名义出兵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镇压。而伊朗虽然并未直接介入巴林事务,但也从舆论上和外交上对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其结果是巴林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斗争”。有评价指出“在海湾地区,对伊朗的遏制令地缘政治因素趋于复杂。由于海湾地区的抗议者是什叶派穆斯林,阿拉伯各王室经常祭出‘伊朗牌’来为血腥镇压抗议活动正名。”<sup>⑩</sup>

具体来看,沙特领导的海合会积极介入巴林事务的原因包括遏制伊朗利用什叶派抗议进行渗透、维护海合会集体安全尤其是君主制体制的稳定、防止巴林什叶派抗议向沙特这样的海合会国家扩散等。

在沙特看来,什叶派主导的巴林民众抗议对其国内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什叶派一旦在巴林获得成功将对沙特东方省长期对政权严重不满的什叶派产生示范作用,<sup>⑪</sup>而东方省什叶派聚集区作为沙特重要的石油产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在巴林什叶派抗议期间,沙特的什叶派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骚乱。在海合会国家中,除巴林什叶派占绝对多数外,科威特什叶派占人口的25%左右,沙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的什叶派人口在5%—15%之间,<sup>⑫</sup>如果巴林的什叶派起义蔓延至海合会国家,无疑将冲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安全和海合会的集体安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沙特特别强调“伊朗是巴林反对派的背后支持者,因此必须予以镇压”,“沙特不同意巴林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sup>⑬</sup>。因此,沙特干预巴林事务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沙特一直“倾向于把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因为伊朗是现代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的发祥地”<sup>⑭</sup>。

因此,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国内什叶派问题、海合会集体安全、遏制伊朗三大因素构成了

沙特主导海合会介入巴林事务的主要原因。这也恰如有关评价所言:巴林逊尼派“政权在1500名跨海登陆半岛的沙特阿拉伯士兵的支持下,向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温和的改革者甚至医院的医生都遭受了拷打、电击的酷刑,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是伊朗的特工。此次镇压旨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以永久震慑巴林的什叶派改革者以及与他们同一教派的、生活在海峡对岸的沙特阿拉伯东方省什叶派”<sup>⑮</sup>。这一评价无疑比较准确地切中了沙特干预巴林事务的实质。

从伊朗方面看,尽管巴林和沙特都把伊朗界定为巴林什叶派起义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巴林反对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迄今并没有伊朗直接介入巴林什叶派抗议的证据。在舆论层面,伊朗刻意从淡化教派关系的角度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作出反应,伊朗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并从伊斯兰革命的角度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定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为“伊斯兰觉醒”(Islamic Awakening),它“正在实现伊朗努力奋斗的目标即清除西方霸权”<sup>⑯</sup>。2011年3月2日,在庆祝波斯新年之际,哈梅内伊表示伊朗坚决支持地区范围内的“起义”,伊朗既支持什叶派同伴,也支持作为穆斯林世界大多数的逊尼派。他指出“我们对加沙、巴勒斯坦、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巴林和也门采取无差别政策。32年来,我们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并不是什叶派。什叶派或者逊尼派并不是问题所在。(阿拉伯)抗议是一个民族反对压迫的斗争。”<sup>⑰</sup>

在外交层面,伊朗对巴林政府和沙特镇压民众抗议浪潮进行了抗议,严厉谴责巴林政府对民众的暴力行动,抗议沙特军队进入巴林以及美国对这一行动的支持,同时警告海湾国家对巴林进行武装干涉将付出沉重代价。但伊朗对巴林和沙特联手镇压民众抗议并未作出进一步的过激反应,只是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2011年3月21日,在巴林抗议遭到镇压后,哈梅内伊再次表示“支持巴林革命”,但没有作出升级的反应更没有作出军事上的反应。即使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都认为,尽管伊朗的地区影响在不断扩大,但伊朗

并非巴林抗议的发起者。<sup>④</sup>因此,在巴林的教派矛盾问题上,沙特的行为具有主动出击的特点,而伊朗的行为则具有被动应对的特点,沙特对巴林事务介入的程度远高于伊朗。

因此,伊朗对巴林的反应在总体上是低调谨慎的,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介入程度远低于对叙利亚问题的介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林和叙利亚对于伊朗的战略地位不同。由此可见,伊朗并未因教派矛盾失去外交理性,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却不断强调伊朗为巴林什叶派抗议的“幕后黑手”,不断夸大伊朗对什叶派的支持,这是中东教派冲突在国际舆论中被夸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教派矛盾的日益突出与沙特等国家不断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有重要关联。

第三,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在外交舆论上要求海湾阿拉伯国家顺应政治变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渲染和夸大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默许乃至纵容海湾国家对巴林什叶派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对海湾地区教派矛盾的恶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导致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掺杂了许多大国干涉的内容。

巴林对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有重要战略价值。巴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维护巴林稳定对于美国控制波斯湾和印度洋海洋通道具有突出的战略重要性。“由于具有战略重要价值的美国海军资源集中部署在海湾地区,因此华盛顿不愿谴责对抗议民众的残酷镇压。美国尽管对镇压采用了强硬的措辞予以抨击,但其暧昧态度令海合会敢于疯狂压制以什叶派为主的抗议民众提出的诚挚的民主要求。美国的压力对于推动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革命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华盛顿对海湾国家抗议民众的支持则远远不够。”<sup>⑤</sup>美国也对沙特等海湾国家从伊朗威胁和教派冲突的角度看待巴林问题表示认可,一位美国官员指出,伊朗在利用巴林的什叶派起义,增强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挑起科威特、巴林和沙特的教派矛盾。“如果巴林社会陷入分裂,并且迟迟无法找到解决现存危机的办法,伊朗将成为巴林危机的最大受益者。”<sup>⑥</sup>美国渲染海湾地区的

教派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宣扬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强化教派矛盾和冲突,客观上有助于孤立伊朗等反美国家、转移逊尼派亲美国家内部的矛盾、掩盖美国的霸权意图”<sup>⑦</sup>。

在巴林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于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策,“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在为北非的民主胜利欢呼之后,却以沉默来回应威胁着其海湾盟国的革命性变革”<sup>⑧</sup>,“奥巴马倾向于与存在侵犯人权和制度性歧视的巴林政权保持一致”<sup>⑨</sup>。一位巴林什叶派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人(在巴林)无所作为,他们正忙于伊朗事务。美国因为第五舰队才注意到巴林。但我们不需要第五舰队,我们需要自己的解决方案。”<sup>⑩</sup>美国在巴林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引起了什叶派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促使什叶派反对派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海湾逊尼派政权结成了共同反对什叶派的同盟。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

### 结语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中东国家国内政治、中东地区格局两个主要层面。这些表现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中东域内外力量将教派矛盾的政治化和工具化,既表现为中东国家内部利用教派矛盾的政治权力斗争,也表现为地区大国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政治联盟,争夺地区主导权。通过剖析巴林的教派矛盾不难发现,教派矛盾并非巴林问题的实质,教派矛盾只是逊尼派政权和什叶派反对派权力和利益矛盾的载体,而巴林国内外势力对教派矛盾的强化,是导致教派矛盾表面化的根本原因。巴林教派矛盾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派矛盾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其次,教派矛盾是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最后,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因此,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当前,中国的学界和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夸大教派矛盾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对中东问题本质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过分强调教派矛盾和冲突不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宣传。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曾三次行使否决权,



当时被部分阿拉伯舆论解读为中国支持什叶派;在国内甚至也有舆论将中国、俄罗斯划入支持什叶派的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因为中国的政策选择并未从教派出发,而是以反对武力干涉、主张政治解决作为基本立足点。但是,如果中国舆论过分强调教派矛盾,无疑会让外界对中国的中东研究和中东政策产生误解。因此,围绕中东的教派问题,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舆论界,都要在研究层面做到历史、客观地看待问题,在舆论宣传层面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 Analysis Paper, No. 29, April 2013, see from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3/04/sunni%20shia%20abdo/sunni%20shia%20abdo>.

③⑧⑬⑮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参见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载于《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

④参见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⑤Wilfried Buchta, "Tehran's Ecumenical Society: A Veritable Ecumenical Revival or Trojan Horse of Iran?", in Rainer Brunner and Werner Ende(eds.), *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 Religious Culture & Political Culture*, Leiden: E. J. Brill, pp. 333-334.

⑥Charles Kurzman(ed.), *Modernist Islam 1840-1940: A Source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81.

⑦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14, p. 6 p. 3 p. 4.

⑨⑱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⑩吴云贵《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⑪⑫汪波《海湾地区“什叶派新月带”兴起的宗教政治影响》,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1期。

⑬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The World's Muslims: Unity and Diversity", see from <http://www.pewforum.org/Muslim/the-worlds-muslims-unity-and-diversity-executive-summary.aspx>.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Graham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121, p. 121, p. 121, p. 121, pp. 126-127.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Luayy Bahri, "The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Shiite Opposition in Bahrain", i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11, No. 3, 2000, p. 131, p. 131.

㉚㉛㉜㉝㉞㉟㊱㊲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opular Protest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II): The Bahrain Revolt", in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port*, 2011, No. 105, April 6, 2011, p. 2.

㉞㉟㊱㊲Human Rights Watch, "Routine Abuse, Routine Denial: Civil Rights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Bahrain", see from <http://www.hrw.org/reports/1997/07/01/routine-abuse-routine-denial>.

㉟㊱㊲关于2004—2005年什叶派抗议和什叶派组织发展的情况可参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ahrain's Sectarian Challenge", in *Middle East Report*, No. 40, May 6 2005.

㊱㊲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see from [http://www.fpi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http://www.fpi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Fatima Ayub, *The Gulf and Sectarianism*,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013, p. 2.

㊿[英]帕特里克·科伯恩《欢欣鼓舞之后:论阿拉伯起义》,载于《译品》2012年第12期。

㊿"Ayatollah Khamenei Nowruz Message", see fr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4GvFGTLQZw>.

㊿"Gates Accuses Iran of Complicating Things in Bahrain", in *Al Arabiya English*, March 24, 2011, see from <http://english.alarabiya.net/articles/2011/03/24/142891.html>.

㊿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see from [http://www.fpi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http://www.fpi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慧]